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  
研究中心丛书

# 鉴往瞻来

——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儒学文化研究集刊》

(卷一)

徐洪兴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http://www.fudanpress.com.cn)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  
研究中心丛书

# 鉴往瞻来

——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儒学文化研究集刊》  
(卷一)

徐洪兴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洪兴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0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丛书)  
ISBN 7-309-05185-8

I. 鉴… II. 徐… III. 儒学-研究-文集 IV. 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9284 号

## 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徐洪兴 主编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陈士强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54 千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100

---

书号 ISBN 7-309-05185-8/B·252

定价 2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丛书》  
编委会

编 委(以中文姓氏拼音为序):

陈 来 陈卫平 杜维明 甘 阳  
郭齐勇 李明辉 吴 震 小岛毅  
徐洪兴(主编) 杨国荣 张汝伦

##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简介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fucian Culture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机构,由复旦大学主管,设立于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 宗 旨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儒学研究为基本宗旨。力图通过学术活动,以达到增进学术、传承文明、团结同仁、促进交流、扩大影响之目的。

### 任 务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任务包括:

一、开展学术研究。侧重研究儒学的历史传承与演变、儒学的基本理论与经典、儒学的传播与交流、儒学与其他思想文化之关系、儒学的社会影响与作用、儒学的发展可能性与方向等基本问题。

二、开展学术交流。定期举办国内或国际的儒学文化学术研讨会。

三、编辑出版《儒学文化研究》集刊,支持出版“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丛书”。

## 组 织

一、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理事会由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一人，理事三人组成。理事会审核决定研究项目及中心重大事项，筹措中心经费，监督研究计划及财务管理制度的实施。

二、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

三、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下设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十一人组成，设主任一名。另设学术秘书一人。委员会成员由学者推荐、理事会审定，主任由理事会在委员中聘任。学术秘书由学术委员会主任聘任。学术委员会负责研究项目计划的制定、学术项目的评估、学术成果的鉴定验收。

四、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下设管理办公室。管理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秘书一人。管理办公室负责资金管理和秘书事务。

## 研究 人 员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不设专职研究人员。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心面向全国聘任兼职研究员。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兼职研究员的聘任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流动的。

## 中心人员名录

### 理事会

理 事 长：孙荣祥

副理事长：卫民权

**理 事:** 徐洪兴 熊庆年 谢惠琮

## 中心

**主 任:** 孙策祥

**副主任:** 徐洪兴 熊庆年

##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徐洪兴

**委 员**(以中文姓氏拼音为序):

陈 来(北京大学)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

甘 阳(香港大学)

郭齐勇(武汉大学)

李明辉(台湾中央研究院)

吴 震(复旦大学)

小島毅(日本东京大学)

徐洪兴(复旦大学)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

张汝伦(复旦大学)

**秘 书:** 郭晓东(复旦大学)

## 管理办公室

**主 任:** 熊庆年

**秘 书:** 邬雪帆

**首批兼职研究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白 奚(首都师范大学)

陈居渊(复旦大学)

丁为祥(陕西师范大学)

董 平(浙江大学)

方旭东(上海大学)

郭 建(复旦大学)

郭晓东(复旦大学)

梁 涛(中国社会科学院)

林宏星(复旦大学)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

杨泽波(复旦大学)

杨志刚(复旦大学)

# 目 录

|                                     |     |     |
|-------------------------------------|-----|-----|
| 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现况及其展望·····            | 黄俊杰 | 1   |
| 20 世纪中国经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 陈居渊 | 61  |
| 礼学百年历程的回顾(上)·····                   | 杨志刚 | 79  |
| 现代性焦虑下之迷思：近年来的儒家政治哲学<br>研究·····     | 郭晓东 | 92  |
| 由西学化向本土化的复归<br>——一百年来孟子研究的历史回顾····· | 杨泽波 | 126 |
| 1980 年代以来大陆的朱子学研究·····              | 方旭东 | 145 |
| 明代儒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钱 明 | 167 |
| 20 世纪儒家亲情伦理所遭遇的批评及其角度的<br>转换·····   | 丁为祥 | 202 |
| 近 20 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胡治洪 | 228 |
| 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        | 石立善 | 266 |

# 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 现况及其展望\*

黄俊杰

## 一、引言

“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研究”是近十余年来在东亚研究学科中,较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并且出版论著较多的一个学术领域。这个领域不论就其研究主题的多元性、研究内容的复杂性、研究地域的广袤性而言,或就其时间之绵延性而言,均极具发展的潜力。就其研究主题言之,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涉及政治权力之转换与社会经济之变迁,亦与诠释者之思想倾向及时代思想氛围密不可分,研究主题多元多样。就其研究内容言之,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涉及小学、名物制度之学、思想史以及诠释学之知识,可谓“下学而上达”,考据与理论兼而有之。就其研究之地域言之,儒家经典是东亚各国和地区知识分子必读之典籍,数千年来中、日、韩、越及台湾各地思想史之发展,与各地思想家对中国经典之解释有极其深刻之关系,但各地之诠释却展现其他地域性或民族性之特色。儒家经典诚可视为东亚各国思想史之公分母。儒家经

---

\* 本文曾以繁体刊于《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东亚文明研究丛刊. 26)(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

典中之普世价值与东亚各国地域特性相激相荡,刺激东亚周边地域之思想家出新解于陈编,经典的普世价值正在于其对各地解释者的召唤之中日益彰显。就其时间范围言之,儒家经典是数千年来东亚思想发展之原点,历代思想家阐释经典,继往开来,自古至今,绵延不断。儒家经典的超时间性,正是建立在时间的绵延性之中,因此,“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之研究”此一领域,近十余年来之所以吸引中外学者之注意,群起而寻幽访胜,推陈出新,实属理所当然,事所必至。

本文写作之目的,在于检讨“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这个学术领域的发展现况,并站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并不从事巨细靡遗的目录学式的回顾,因此,本文并不企图胪列此一领域所有的中外研究论著书目。本文将以“问题导向”之方式,检讨现有的研究成果,特别集中在儒家经典之范围,归纳现有研究论著主要的问题意识,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新议题。

## 二、东亚儒家经典诠释 传统研究的现况

关于“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这个领域,近数十年来颇受中外学术界重视,出版论著为数极多,相关研究书目的回顾<sup>①</sup>,以及晚近出的两本英文专书<sup>②</sup>,已有论文加以检讨,本文并不对这个领域进行目录学式的回顾,而将近十余年来重要论著中所呈现

---

① 方克涛:《英美学界对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回顾与展望》,收入黄俊杰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通论篇》(东亚文明研究丛书.2)(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1—262页。

② 李淑珍:《当代美国学界关于中国注疏传统的研究》,收入《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通论篇》,第263—304页。

的问题意识加以归纳,并略述其要点如下。

### (一) 东亚儒家经典诠释的类型、特质与方法

近十年来,汤一介提倡“中国的解释学”不遗余力<sup>①</sup>,此外,大陆学界也有二册论文集出版<sup>②</sup>,洪汉鼎主编的《中国解释学》第一辑也在2003年10月出版<sup>③</sup>。台湾大学的部分教师,在1998—2000年之间,自主地筹组并推动《中国文化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包括十余个子计划,取得初步成果。从2000年以降,这项计划转型为《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参与之教师与研究生更多,在这项研究计划的推动之下,中外学术界关于“东亚儒家经典诠释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活动日益活跃,该计划出版中文专书累计已十余册<sup>④</sup>。但较有系统地探讨一般意义下的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类型、特质及方法等问题而撰成专书的,则有张隆溪<sup>⑤</sup>、董

① 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2000年);《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第7期(2000年)。《“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以上四文皆收入:汤一介:《和而不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② 成中英编:《本体与诠释》(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陈少明编:《经典与解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本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该刊每年出版一册,主编是洪汉鼎,执行主编是傅永军。

④ 该研究计划已出版论文为数甚多,中文专书14册除由台大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外,亦刊于网站,请参看“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网址: <http://140.112.142.15/MOEPProject/project.asp>。该项研究计划在2004年3月结束后,有关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之研究仍继续在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持续推动,原计划之主持人均为台大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之成员。有关该中心之研究近况,参看: <http://www.eastasias.ntu.edu.tw>。

⑤ Longxi Zhang, *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译本:张隆溪著,陈川译:《道与逻各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洪利<sup>①</sup>、黄俊杰<sup>②</sup>、李清良<sup>③</sup>、周光庆<sup>④</sup>与林义正<sup>⑤</sup>等人。

张隆溪(1947— )对中西文学诠释学极为娴熟,出入中外,悠然自得,所撰《道与逻各斯》一书颇受中外学界注目,并有中译本刊行。张隆溪一向反对自黑格尔以降许多人以中西文化为不兼容之敌体的偏见。他认为,这种将中国视西方的“非我”之态度是一种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sup>⑥</sup>。张隆溪着眼于中西文学传统中的同理同之处,他说:

尽管阐释学作为一种理论是以德国哲学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我们却确乎可以把中国文化传统说成是一种阐释学传统,因为它有一个漫长的、始终围绕着一套经典文本发展起来的诠释性传统,以及建立在大量品评之上的财富。这些东西是可以与为西方阐释学传统提供了基石的圣经诠释相比拟的。以经典的阅读和评论中产生出来的许多理论问题,无论对中国的学者还是对西方的圣经诠释者来说都是共通的,而且在两种文化传统中都直接涉及文学批评<sup>⑦</sup>。

《道与逻各斯》这部书一再强调超越东西文化的差异,而求中西之大同,但是,张隆溪并非浑沦地将中西视为一体,例如他明辨中国的“道”与西方的 Logos 的不同,就极具启发性,他说:

几乎每一部中国古代文本都是一部互文(intertext),然而这互文却颇意味地不同于解构主义批评的理解。解构主义的互文

① 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② 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年);Chun-chieh Huang, *Menician Hermeneutics: A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s in China*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③ 李清良:《中国阐释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⑤ 林义正:《论中国经典诠释的二个基型:直释与旁通——以〈易经〉的诠释为例》;《论中国经典诠释的目的与方法——以〈春秋〉的诠释为例》。

⑥ 张隆溪:《中译本序》,《道与逻各斯》,第11页。

⑦ 同上书,《序》,第23页。

是一个没有起源的“踪迹”，中国的互文作为踪迹却总是引导人们回到起源，回到传统的源头，回到道与儒的伟大思想家们。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文字的力量把作者变成了权威性文本，当从古代著作中引用一句话时，并不存在老子其人或《老子》其书的分别。可见，在中国传统中，文字的权力就这样在受到贬低的同时，也为自己行使了报复，而形上等级制也在刚刚建立之时便以基底遭到破坏。这也许正是“道”不同于逻各斯之处：“道”几乎无需等待直到20世纪才开始的对拼音文字的拆除，无需等待德里达式的解构技巧和解构策略<sup>①</sup>。

在指出中国的“道”与西方的 Logos 不同之余，张隆溪在本书结论中强调：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正是在于欣喜接纳解释的差异。张隆溪从中国传统诗学中对“诗无达诂”的肯定，说明中国传统中存有一种开放的心胸，他称之为“诠释的多元性”<sup>②</sup>。

董洪利的《古籍的阐释》一书，主要目的在于归纳整理中国古籍注释史的发展（第一章），说明注释的目的（第二章），指出注释的内容与方法（第三、四章），以及注释的体式（第五章）。本书内容主要是对中国古籍的注释传统的各种形式的方面，例如分期、通假、词义、句读，以及体式等，加以归纳分类并说明。本书与同类性质的书籍相较<sup>③</sup>，涵盖时间范围较广，但通论多于专论。本书较有创意的是第二章。董洪利在本章中首先指出，古籍的注释均以还原典籍作者的原意为目的，但是，这种追求原意说其实难以成立，因为：（1）作品语言的局限使作者的意图不可能充分而完整地表达出来，言不尽意是作者与作品关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2）作品

① 张隆溪：《中译本序》，《道与逻各斯》，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290—299页。

③ 例如加贺荣治的书就以魏晋为范围，时间范围较为集中，论述较为深入，但广度不及本书。参看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魏晋篇》（东京：劲草书房，1964年），第1—49页。

的完成和作者语境的消失,使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只有宣示义能完整固定在上下文结构的语境之中,而启示义失去确定情境,进入意义未决或多义待决状态。(3)作品若脱离作者语境,就成为自主性的客体,对任何时代的任何读者或解释者开放。(4)作者意图所规定的作品语言和意象是作品意义得以实现的决定因素,但只能决定解释的大致范围和走向,无法限定解释的具体内容和方式。(5)解释者只能在个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知识经验等基础上,发展他的解释<sup>①</sup>。董洪利认为,注释的真实目的就是理解作品的意义。理解作品的意义是一种创造性的解释活动,其创造性就在理解过程之中理解的创造性普遍地存在于古籍注释中。既然理解是一种创造性的解释活动,那么解释者为追求新奇独特的创意,就可能会出现某种主观任意性的解释。如何克服这种任意性的解释,就成为注释理论必须关注的问题。解释的客观性就存在于理解的过程之中,由作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和解释者前理解的相互作用决定的<sup>②</sup>。

黄俊杰长期研究《孟子》诠释史,在他的中英文书籍中,曾以孟子学解释史为中心,归纳中国诠释学的三种类型:(一)作为解经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学:许多儒者透过注经以表述企慕圣贤境界之心路历程,如朱子集注《四书》以建立自己之哲学,解释《孟子》“知言养气”说以表诠个人对生命之体认;王阳明(1472—1529)在其“百死千难”的心路历程中所得之“心即理”与“致良知”之精神体验中,重新解释孟子学,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二)作为政治学的儒家诠释学:由于帝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以君主为主体,而儒家政治理想是以人民为主体,儒家之价值理想难以在现实世界中实践,于是,许多儒家学者在有志难伸之余,以经典注疏之学

① 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2—73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术事业寄寓其经世济民之政治理想,这种诠释学是一种道德学,而且其中“治道”远多于“政道”,如康有为(1859—1927)著《孟子微》于20世纪列强对中国鲸吞蚕食之危机年代,皆寄托其救世宏图于名山事业之中。(三)作为护教学的儒家诠释学:中国历代儒者以经典注疏作为武器,批驳佛老而为儒学辩护者代不乏人,如韩愈(768—824)撰《原道》、《与孟尚书书》以孟子传孔子之道,认为“功不在禹下”,皆有诠释经典以护教之用心在焉。王阳明通过对孟子的“尽心”与“集义”等概念的重新解释以批驳朱子学;清儒戴震(1724—1777)在公元1777年撰《孟子字义疏证》驳斥宋儒及佛老之思想,也是这种类型的中国诠释学的代表作品。

在以上这三个中国诠释学的突出面相中,第一个面相较为重要,历代许多儒者注疏经典,常常或是作为一种个人安身立命的手段,或是作为表达个人企慕圣域的心路历程的一种方式,这正是儒家“为己之学”的一种表现,而将经典解释与个人生命交织为一,这是“融旧以铸新”的传统思考方式。第二种面向与诠释者对社会政治世界的展望有关。诠释者企图透过重新解释经典的途径,对他所面对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是一种“返本以开新”的思考模式。第三面向则是诠释者身处于各种思潮强烈激荡的情境中,为了彰显他所认同的思想系统之正统性,常通过重新诠释经典的方式,排击“非正统”思想。这是一种“激浊以扬清”的思考模式<sup>①</sup>。

黄俊杰进一步指出:中国诠释学的基本性质是一种“实践活动”,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诠释学是以“认知活动”为手段,而以“实践活动”为其目的。“认知活动”只是中国诠释学的外

---

① 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年);Chun-chieh Huang, *Menician Hermeneutics: A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s in China*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部形式,“实践活动”才是它的实际本质。中国诠释学实以“经世”为本<sup>①</sup>。

黄俊杰最近撰文探讨一个经典诠释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东亚儒家思想脉络中,“经典性”如何被定义?黄俊杰从东亚儒学史的思想脉络,厘清构成儒家“经典性”的主要质素。他指出儒家的“经典性”包括三个主要面向:社会政治性的、形上学的、心性论的内涵。儒家的“经典性”依这三个面向而被定义,儒家的“经典”也在这三种思考进路中获得诠释<sup>②</sup>。

经典解释者本身是一种历史情境的产物,那么,解释者的“历史性”应如何安顿?黄俊杰最近撰文针对这个问题有所探讨。他分析东亚儒学经典诠释史所蕴藏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经典以及经典的解释者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各有其“历史性”。为了有效地解释经典,经典解释者是否必须经过解构自己的“历史性”才能进入经典的思想世界?何以故?这个问题既具有东亚儒学的特殊性,又具有诠释学的普遍意涵。黄俊杰扣紧这个问题,以《论语》与《孟子》等儒学经典的解释为例,探讨经典诠释者与经典之间的复杂关系。

黄俊杰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儒家经典诠释学是一种体验之学,诠释者与经典之间构成“互为主体性”之关系。经典解释者的“历史性”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是开发经典中之潜藏涵义的动力。但是,解释者的“历史性”却又是一把“两刃之剑”,它常常也会扭曲经典之意涵。因此,如何适当安顿解释者的“历史性”就成为方法论问题。但是,经典的“超时间性”正是在时间性之中才能建构完成。经典以这种方式建构其“超时间性”,却又涉及经典作者

① 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二),第481页。

② 黄俊杰:《从中日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中国哲学史(季刊)》(北京:中国哲学史学会)第2期(2002年5月),第35—47页。

意旨是否可知,以及经典中的历史叙述与普遍理则之间的紧张性问题。解经者固然不应也不可能完全解消自己的“历史性”,而以一个“空白主体”的姿态进入经典的世界;但也不可过度膨胀解经者的“历史性”,以致流于以今释古,刑求古人。因此,解经者必须在完全解消自己的“历史性”与过度膨胀自己的“历史性”之间,获致一个动态的平衡<sup>①</sup>。

黄俊杰最近也撰文分析儒家经典中的历史叙述与普遍理则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儒家经典中所见的对黄金古代或典范人格的叙述,都是以朝向提炼出普遍的道德理则或抽象命题为其目的。因此,儒家历史学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学或政治学。在这种特质之下,儒家历史叙述是一种抽离普遍理则的手段。但是,问题是:儒家经典中的普遍理则(“道”)及其具体化(圣人及其在历史上的遭遇),却又有巨大落差,而使两者间恒存有紧张性。这种紧张性处处挑战着经典中的“道”的普遍必然性。

清代的汉宋之争其实都忽略了儒家经典中历史叙述与普遍理则之间,实有其互相渗透性。在儒家传统中,“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所谓“性与天道”皆寄寓于具体的前贤往圣之行谊之中,经典正是载“道”之器。在道器不二、理事圆融的儒家传统中,普遍而抽象的理则,只有在特殊而具体的历史经验中才能觅得,所以,儒家思想传统中的“普遍性”乃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用传统的语汇来说,“经”、“史”原不歧而为二,所以,在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研读儒家典籍应该:“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书不徒为章句”,只有“经”、“史”通贯,理事并观,解释者才能掌握儒家经典中“寓抽象性于具体性”及“即特

---

① 黄俊杰:《从儒家经典诠释史观点论解经者的“历史性”及其相关问题》,《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1)(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第39—72页。